

一位被遺忘的傳教士及

三個歷史引發的感想

區華勝

爲紀念馬國賢神父 (MATTEO RI-PA) 誕生三百週年，我的朋友郭永亮君 (PHILIP W. L. KWOK) 特別寫了一本書，名「拿波里與中國——自十八世紀至本世紀初葉」(NAPOLI E LA CINA. DAL SETTECENTO AGLI INIZI DEL NOSTRO SECOLO ; NAPOLI: L. REGINA, 1982)。本書分兩部份：第一部份敘述馬神父生平的大事，佔了全書大部份的篇幅；第二部份報導當日的拿波里王國與中國的商業關係。

正如作者自己聲言，本書的主要目標不在乎爲馬神父寫行傳，(註一) 而在乎介紹馬神父的藝術作品及華人書院 (COLLEGGIO DEI CINESI) 的創立。(註二) 郭君多年居住拿波里，任教于該城的東方大學院，享有近水樓台的便宜，能搜集出一些前人未發現的資料。

馬神父是意大利南部人士，家出望族，生于一六八二年三月廿九日，卒于一七四六年同月同日。年方十五，被父親送至拿波里城就讀，曾有一段時期過着浪漫的生活。十八歲時改過自新，并立志參加遠方傳教的工

作。一七〇五年領受神品，隨即到羅瑪受訓。兩年後被教宗克來孟十一世派來中國，同行者另有五人，馬神父負責管理財政。一七一〇年初抵達澳門，一行數人隨即拜見教宗特使多羅主教 (CARLO T. MAILLARD DE TOURNON)，并向他呈上樞機的紅帽。

翌年年初，馬神父被召進京，初時奉命繪畫，其實當時在宮廷中專事繪畫者已有教士二人。兩個月後，康熙帝調換馬神父做雕製銅版的工作。原來聖祖對銅版印刷早已發生興趣，只可惜未物色到能手，於是囑令馬神父將熱河行宮及大清帝國全圖各製成卅六及四十四版分圖，分別付印成冊。爲了製作新版以取代從前用筆繪畫而欠準確的地圖，康熙陸續派遣在京任職的教士到各地去測量。(註三) 一九二九年在瀋陽故宮博物館曾發現了四十一版的地圖；(註四) 另外在拿波里東方大學院的院長辦公室裏亦保存着一版，惟字跡已模糊，很難辨別。「熱河行宮圖」完成于一七一一年，其中一本現存于拿波里國家圖書館中，書的編號是 I G 75，只有卅五圖，附有馬神父寫的註解，是相當



寶貴的史料。除刻製銅版外，馬神父在宮中還修理沙漏計時器及充當翻譯官，有時還得伴隨聖祖出遊狩獵。

康熙帝的駕崩、禮儀之爭引起的風波、和傳教士們的互相傾軋迫使馬神父決定離開中國，重返歐洲，時在一七二三年。隨行的有四位被他收養在家的中國學生和一位教師。那時的馬神父已是一位名氣甚盛的人物，在歸航中經英國時，英皇佐治一世以隆情召他進宮，跟他作了三個小時的會談，最後還請他和他的學生一起用膳。

馬神父對中國最大的貢獻，除了傳教及在京任職外，要算創辦華人書院了。這座書院于一七三二年獲得教宗克來孟十二及羅馬神聖帝國皇帝嘉祿六世的批准而成立。名義

上雖然稱華人書院，實際上却兼收其他國家的人士。這座書院幾經滄桑，數易其名，當日的院舍今日做了ELENA D' AOSTA醫院。隨着蘇彝士運河的興建及歐亞貿易的發展，意大利政府對東方語言及文化開始重視，於是就地利用已紮有根基的華人書院來訓練它的外交及商務人員，也就是說，開始介入華人書院的行政及學制的各層面。一八六一年，華人書院改名皇家亞洲書院（REALE COLLEGIO ASIATICO），前者成爲後者的附屬，但對內政仍享有相當的自由。一八六八年，新章程被通過，要求大幅改組。一八八八年，華人書院正式被關閉，最後的院長及院生全部退出，傢私被拍賣，所有書籍分三十箱運到香港交給中國傳教區的代理人 and 神父——即後日的和主教（A. PIAZZOLI）。自一九一三年起，皇家亞洲書院又改稱皇家東方學院（REGIO ISTITUTO ORIENTALE）。今日則稱東方大學院（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另有新的院舍。至此，馬神父首創的華人書院已面目全非，留下的只有馬神父的骨骸，默默無聞的在小聖堂祭台下的墓穴內安息。馬神父的立品案在上個世紀已着手進行，（註五）今日到了什麼地步則不可得知。

以下是筆者對馬國賢神父事件的一些反省。

(一)明末清初來華的教士，除了抱有敬主和傳教的熱忱外，還是些飽學之士，精通天文、音律、曆法、數理、工程、醫學、軍器、繪畫等等，也就是通過這些專長受到社會人士的尊重及賺得傳教的機會。康熙是一個開明的君主，他以滿人的身份入主中原，羨

慕中國的文化，且承認儒家是這文化體系的支柱，聖祖的這種態度，在禮儀之爭的問題上可以說是表露無遺。但另一方面，他也賞識西洋文明，所以才邀請了這麼多西洋才子入朝供職。不過他自己本人却崇奉道教，而且一如其他君主，有嬪妃纏身（見馬神父的熱河行宮圖），即使沒有禮儀之爭的事發生，教士們可以在中國多留一段時間，但却不可以奢望他會皈依真主和信奉基督的。過去，教會一部份有勢力的保守人士禁止傳教士們幹這個幹那個，阻止修生們學這樣學那樣，無異是作繭自縛。今日教會內又掀起了一陣對傳教方法的爭論，即傳教以何者為先、何者為主的問題：傳揚信仰呢？抑或做文教社會工作呢？原則上及以教會圈子的眼光來看，當然以前者為是，但實際上及走出教會的圈子來看，可能後者為對，因為傳教要求有利的環境，需要鋪路的工作，一如其它事業，要按步就班，不能急蹴，正所謂「欲速則不達」。擺在我們面前的歷史殷鑑，我們不可忘記。

(二)歐洲古老有名的大學，如巴黎、劍橋、牛津、科倫、土平根、波羅拿、維也納等都經過教宗的立案，曾經有過一個時期直接或間接的受過教會的影響。後來它們漸漸的跟教會脫離關係而成為國家經管的學府，這是一種自然的趨勢。今日這些大學不論在規模、師資、聲譽都超過教會本身辦的。教會在某些社會機構和工作上只有啓蒙、輔導、和鋪路的使命，一旦國家政府有能力為自己辦到，就應知時退出，讓政府去辦，不該將暫時性的認作是永久性的，亦無需為往事而生悲。上述的原則可應用到馬國賢神父創辦的華人書院。今日意國拿波里城的東方大學院是個頗有聲望的專門學府，假如不是由政

府接辦，恐怕今日只會苟延殘喘，在生死邊緣上掙扎而矣。相信馬神父在天之靈必會因見到他的華人書院盡了歷史的使命而感到安慰和自豪的。

(三)修會原是為福音做更深和更明顯的見證而存在的，它們的成立有賴教廷（教宗）的批准，它們受教廷的指揮服務，而教廷將若干優待及特權賜給它們。在這種制度下，修會在過去和現在是否為福音做了天真無邪的見證，還是個令人尋究的問題。修會為教會做的貢獻，無可置疑；但它們有時給教會帶來的困擾，我們亦無需否認。試問，過去和現在為何有些國家的政府既容許地方（世俗）神職或修會的存在，而不准許國際修會（好比跨國集團）的立足呢？當筆者本人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廿七日憑吊了馬神父的墓穴步出ELENA D' AOSTA醫院（昔日的華人書院）時，我的朋友郭君突然感慨繫之的對我說：「看！許多中國人士及教友都知道利瑪竇的大名，因為有人為他捧場；但馬國賢為中國人做的事亦不算少，可惜很少人認識他，更無人為他宣傳，因為他不是一個會士。」郭君當時低沉的聲調、黯然的神色，至今我猶然記得。

附 註

(一)論及馬神父的生平及華人書院的歷史，主要的有馬神父親手撰的LA STORIA DELLA FONDAZIONE DELLA CONGREGAZIONE E DEL COLLEGIO DEI CINESI SOTTO IL TITOLO DELLA SAGRA FAMIGLIA DI GESU CRISTO, 3 VOL.; NAPOLI, 1832. 這本書由F. PRANDI

節譯，名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LONDON, 1861. 此外有上海土山灣1917年出版的「那不勒斯聖家修院名錄」ELENCHUS ALUMNORUM, DECRETA ET DOCUMENTA QUAE SPECTANT AD COLLEGIUM SACRAE FAMILIAE NEAPOLIS. A. S.ROSSO, APOSTOLIC LEGATIONS TO CHINA OF THE 18TH CENTURY; SOUTH PASADENA, 1948, G. NARDI, I CINESI A NAPOLI; ED. DEHONIANE, 1976. 羅光著，教廷與中國使節史，台灣光啓，1961年，137—186頁。羅光主編，天主教在華傳教史集，台灣光啓及香港真理學會，

1967年，338—339頁。方豪著，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二冊，香港真理學會，1970年，343—348頁。方豪著，六十自定稿上冊，台灣學生書店，1969年，398—400頁。

(二)華人書院還有其他的譯名：聖家書院、中國學館、中華書院、文華書院。

(三)楊富森著，中國基督教史，台灣商務，1968年初版，153—154頁提及這件事，且詳列各教士之名，獨不見有馬國賢。

(四)見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526頁。

(五)NEAPOLITANA BEATIFICATIONIS ET CANONIZATIONIS SERVI DEI MATHAEL RIPA CONGREGATIONIS SACRAE FAMILIAE ET NEAPOLI SINENSIIUM COLLEGIO FUNDATORIS; NEAPOLI, 1874.